

天龙山石窟始凿于北魏，其后东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现存二十五窟，分列于东西两峰山崖间。

从魏晋到隋唐时代，并州晋阳地区的境况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北朝后期古都晋阳的崛起与尔朱氏家族的经营以及北齐政权的发展关系密切，而尔朱氏家族与北齐政权的崛起，又与北魏后期“六镇反叛”所造成政治危机分不开。出身于忻代地区的尔朱氏集团以及后来高氏北齐政权在镇压“六镇反叛”过程中积聚了力量，开始以晋阳地区为基地，进一步主宰朝政，笔者称之为“晋阳集团”，正好与著名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关陇集团”相对应。北齐开创者高欢击败了尔朱氏家族势力，创建了北齐政权，并且仍将其政治中心定在了晋阳。而与平城、洛阳、邺城等几大都城相对比，晋阳之地确实占据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其最终成为唐朝的“北都”，并不单纯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六镇反叛天下大乱

现代学术界对于北魏后期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北魏后期的政治矛盾以所谓“六镇起义”为导火线，突出地反映在以首都洛阳为中心的中央朝廷与北方边陲六镇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与不和谐上。通常认为：一方面，北魏孝文帝迁都改制，全面接受华夏汉族文化，激化了中央朝廷与鲜卑族贵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以六镇为代表的边镇军事集团在后来的政治变革中受到了忽视，心中不满。最终导致边镇变乱蜂起，北方地区动荡，北魏覆亡，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取而代之。

在我看来，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变化，不能简单归因于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或北方“六镇起义”，还必须联系当时客观的地理形势及其影响。常言道：“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直接改变了北魏前期所形成的政治及军事地理格局与边防形势，而这种政治、军事地理及边防格局的改变影响巨大。一方面，冲击并严重削弱了北魏原有的军事防御体系与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大激化了其军人集团与中央官府文人集团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的内忧外患严重损害了北魏王朝的政治基础，对于北魏后期的政治与社会形势变化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北魏政治与军事历史的研究中，研究者不能因为北魏后期六镇的变乱，而否认“六镇”在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军人集团在北魏边防体系中的地位与重大贡献；也不能将北魏后期的覆亡简单归结于“六镇”军人集团的操弄。因此，理解北魏“六镇”问题在北朝前期与后期的不同地位与影响，是理解北魏覆亡问题的一大关键，也是理解北朝后期“晋阳集团”出现乃至山西地位崛起的关键。

北魏正光末年，北边军镇地区出现反叛浪潮。广阳王元深曾经奉命北上，进行弹压。他本人在上表中将北方六镇地区积弊难返的情况作了最详尽的说明。迁都洛阳之前，北方六镇声名显赫。北魏前期曾大搞边防，许多名门望族后裔及豪杰之士汇集于此，人称为“官至便登”之地，富有雄心壮志的人士都纷纷来到六镇，希望一展抱负，光宗耀祖。但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全面推行汉化。又是改汉姓，又是禁“北语（主要指鲜卑语）”，舞文弄墨的人（即文人）大受青睐，而六镇的武士们似乎被人淡忘了。“一迁定终身”，再想要离开边塞，绝非轻而易举。镇将们得不到升迁，便把怨气撒到下属身上，大肆贪污，胡作非为，下层军士犹如置身苦海，度日如年。同时北魏中央正规军队孱弱，受到了北镇军人的轻视。（参见《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元深传》）

然而，北魏末年的朝政糜烂，却让六镇人士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北齐王朝的创立者高欢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证。高欢，字贺六浑，渤海蓚（治今河北景县）人。他的六世祖高隐曾任玄菟郡太守，而其五世祖高庆、四世祖高泰、三世祖高湖都曾在慕容鲜卑政权里任职。慕容后燕失败后，高湖率众归于北魏，曾任右将军之职。高湖之子高嵩后因犯法，被发配到怀朔镇（治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怀朔镇为北方六镇之一，高欢就出生于白道南。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根据文献记载，“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经过反复迁徙，高欢一家虽然原居于中原，但至北镇后已经完全鲜卑化了。高欢曾经担任函使六年，经常往来于怀朔镇与洛阳之间，对于北魏后期首都洛阳一带的情况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一次，平素节俭的高欢从洛阳回来后，一反常态，倾其所有，款待宾朋。亲朋不免大为吃惊。高欢解释道：“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辎，朝廷惧其乱而不同。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上》）

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最终在“六镇反叛”的硝烟中释放出来，边镇军民也因此四散溃逃，各奔东西。北魏孝昌元年（525），柔玄镇将杜洛周在上谷反叛，早有心理准备的高欢与他的“同志们”马不停蹄地寻找飞黄腾达的地方。他们先是投奔杜洛周，后来又依附葛荣，最后才归到了一代枭雄尔朱荣的麾下，成为尔朱荣的得力干将。由此可见，高欢家族的迁徙经历与高欢

晋阳集团与北齐崛起

安介生



550年，高欢的儿子高洋废东魏皇帝自立，建立北齐。北齐的都城虽然还在邺，但晋阳是高氏父子的创业之地，北齐统治者将晋阳定为“别都”。

等人在“六镇起义”后的活动是极具代表性的，其实这也是大部分六镇人士的生活轨迹的变化，以及在变乱情况下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路线。并州及晋阳地区也正是人们的往复选择中迎来了发展的机遇。

晋阳集团因势崛起

在边镇起事及平叛过程中，崛起于忻代地区的尔朱荣集团曾经强盛一时，十分引人注目。北魏时期，并州以北地区的游牧文明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尔朱氏家族就是游牧部落出身。北魏正光年间，尔朱荣部落的命运迎来重大转折。“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至此，身为游牧部落的尔朱氏家族加入了北魏末年的政治纷争。秀容川逼近北方边镇地区，在平叛作战过程中，尔朱荣的势力借机发展，逐渐强盛起来，后占据肆州（治今忻州市西北），成为一方霸主。“自是，

在边镇起事及平叛过程中，崛起于忻代地区的尔朱荣集团曾经强盛一时，十分引人注目。北魏时期，并州以北地区的游牧文明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尔朱氏家族就是游牧部落出身。北魏正光年间，尔朱荣部落的命运迎来重大转折。“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至此，身为游牧部落的尔朱氏家族加入了北魏末年的政治纷争。秀容川逼近北方边镇地区，在平叛作战过程中，尔朱荣的势力借机发展，逐渐强盛起来，后占据肆州（治今忻州市西北），成为一方霸主。“自是，

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被学者

毁其形。后上党人居晋阳者，号上党坊。神武实居之。”可见，当时晋阳城有上党坊，高欢就居住在其中。而在击败尔朱氏势力之后，高欢建置邺都，同时还将晋阳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又“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从此，高欢大部分时间也生活在晋阳。后来史臣总结道：“高祖以晋阳戎马之地，霸图攸属，治兵训旅，遥制朝权，京台机务，情寄深远。”（《北齐书》卷十八）这也是尔朱荣、高欢等人战略思考的最好总结吧。

简短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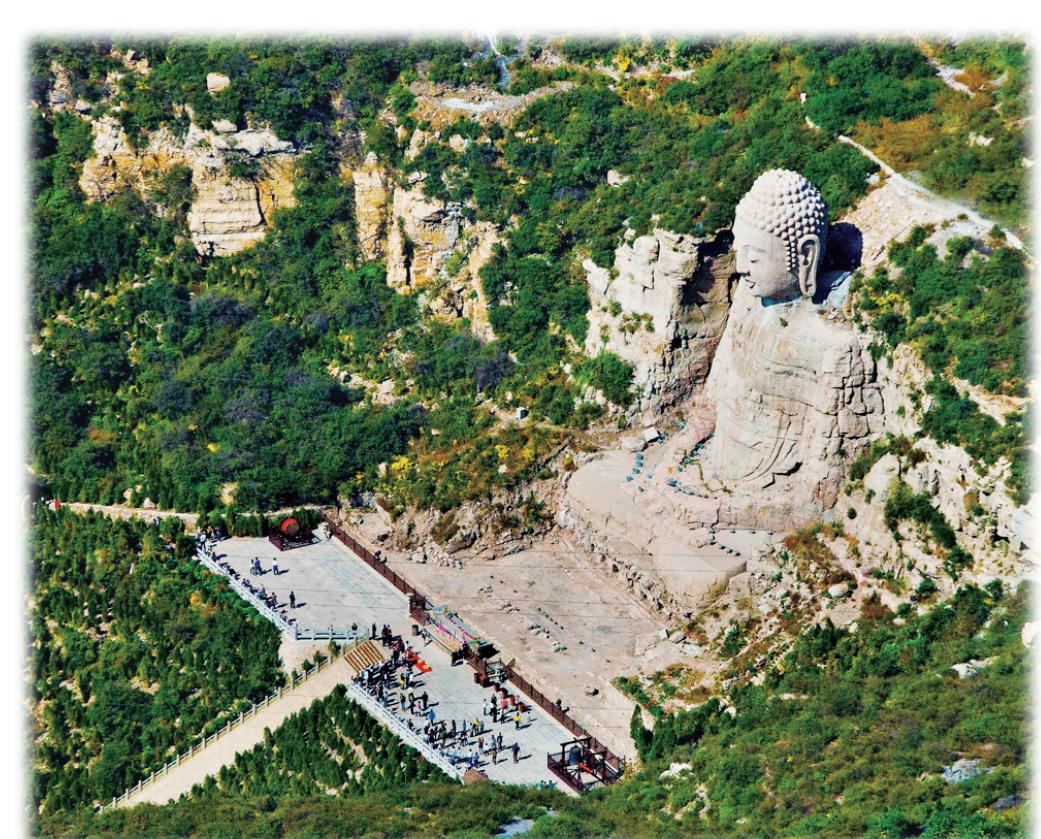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特意阐发了“关陇集团”及其历史意义：“……则知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构成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我以為：在“关陇集团”形成之前或同时，在并州晋阳之地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地方性军人集团，即“晋阳集团”。而这个军人集团，以聚集于晋阳之地的六镇军人为主体，正是尔朱氏地方势力称霸一时，以及高欢北齐政权建立的基础。简而言之，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反叛之后，北边“六镇”军人集团后来分化成两大集团：“晋阳集团”与“关陇集团”。这两大集团后来也成为东魏、西魏，以及后来的北齐、北周政权建立的基础。究其始，比较晋阳、关陇两大集团之发展情况，尔朱荣、高欢所代表之“晋阳集团”并没有处于明显的下风，甚至可以说，发展更早更加强盛，足以势均力敌。所以，以魏征为代表的唐朝人士对于北齐的迅速覆亡深感痛惜。（参见《北齐书》卷八后）

“晋阳集团”的崛起，古都晋阳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高欢及北齐政权选择邺都与晋阳之两都制，完全基于现实的政治与军事考虑，是一种极其明智的选择。简而言之，邺都接近中原，方便控制太行山以东地区，同时也能获得经济补充；而晋阳占据战略要地，保持军事威慑力量，兼顾南北，既便于军事防御，也有利于协调各民族关系。因此，北朝后期北齐与晋阳的崛起，既有着复杂的历史变迁之大背景，也与客观地理形势直接相关。所谓的“长时段研究”，是依据地理时间的研究，也是在客观地理大背景下对于历史变迁的重新审视。强调北朝后期“晋阳集团”与北齐政权在并州太原的崛起，正是在“长时段”视野下对于北朝历史发展重新审视的结果。唐朝龙兴于晋阳地区，后又将晋阳定为“北都”，也更多出于客观地理环境及军事防御的考虑，而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

讲座地点：晋祠晋溪书院
主讲人：安介生
时间：2023年7月23日



安介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访问学者，兼任《历史地理研究》编委、中国古都学会理事、复旦大学历史学学位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2年9月起担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暨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十余项，已有《山西移民史》《历史民族地理》《中国移民史》（第7卷）《江南景观史》等数十部著作出版。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百度

蒙山大佛，始建于北齐天保年间，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是中国北朝时期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徐勤松 摄